

敦煌学研究的先行者——陈寅恪先生

张智燕 刘 雯

(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49)

【内容摘要】陈寅恪先生在文学、史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,为世公认。对于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则较少有人提及。其实,他有关敦煌学的著述虽然数量不多,篇幅不大,但学术价值很高,意义重大。本文欲就此加以分析整理,以彰显一代国学大师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。

【关键词】陈寅恪 敦煌学 研究

陈寅恪(1890—1969年),字鹤寿,祖籍江西修水,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官僚家庭。早年曾留学日本及欧美,学习和研究各国语言和文学、政治、历史。1925年回国后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,1929年,被清华大学中文、历史、哲学三系聘为教授,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、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、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携全家逃离北京,流亡至长沙、云南、香港等地,教书写作,历尽艰辛。抗日战争结束后,回到清华大学任教。1948年南迁广州,任岭南大学教授,1952年后为中山大学教授。1955年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。在“十年动乱”中,陈先生受到很大冲击,加之年老多病,于1969年病逝于广州。

陈寅恪先生不仅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国学大师,同时也是著名的敦煌学者,对敦煌学研究作出很大贡献。他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主要收录于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、《寒柳堂集》两部著作中,约30篇左右。尽管篇幅不是很大,然而学术价值很高,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意义十分重大。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:

一、首次提出要建立敦煌学,并阐明敦煌学研究意义,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

在中国敦煌学术史上,陈先生虽然不是研究敦煌资料的每一人,却是提出“敦煌学”这一名称的第一人。1930年,在《敦煌劫余录序》中,他指出:“敦煌学者,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。”他高瞻远瞩,从世界学术发展趋势的角度提出研究敦煌学的意义。

众所周知,在20世纪初叶,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打开后,发现了大量十六国至唐宋时期的写本、绘画等珍贵文物,这些国宝被斯坦因、伯希和等西方国家的学者洗劫一空。为此,爱国人士无不扼腕叹惜,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痛心的反思,陈先生写道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
陈先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,他还进一步借这个伤心史来唤醒和激发国人自强不息,“囊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”,为祖国争得荣誉。当人们把北京图书馆的敦煌藏本看成劫后唾余而怀疑它的价值时,陈先生却披沙见金,就自己

阅读所及,从宗教、历史、文学等方面列举了这些卷子的重要价值,无疑给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,展现了新的领域,足以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和重视北图所藏敦煌卷子。

二、利用敦煌文书,对一些佛教史疑案,提出新的看法;阐发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联系

敦煌石室所出4万余件写本中,汉文写本在3万以上,而其中佛典占9成。辨识这些距今已有千年以上历史、书写成各种文字当的经卷,殊非易事。然而,陈先生知识渊博,学贯中西,通晓梵文、突厥文、西夏文等多种古文字。他不仅能熟练辨识各种佛典,而且就本身提出许多问题,结合当时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进行综合研究,对一些佛教史上的疑案,提出新的见解。例如,《旧唐书·则天皇后本纪》及《旧唐书·薛怀义传》说武则天上台时,“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”,又认为该经系薛怀义等伪造。陈寅恪先生据敦煌所出《大云经疏》更正了这种说法。他认为武氏所颁《大云经》,实际上是北凉时期法护译本《大方等大云经》。薛怀义等当时即取旧译之本,附以新疏,其于法护原文,则全部袭用,并无改易。这一研究澄清了《旧唐书》中对武则天的一些描绘,对武则天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,作了进一步的推证。

陈先生在研究合肥张氏收藏《敦煌写本金光明经残卷》时,与马洛甫本回纥文金光明经及西夏文本比较研究,得出“是佛经之首冠以感应冥报传记,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”的结论。接着,他又举出现存《金光明经》的各种译本,有梵文本、汉文本(其中包括十六国、隋唐的各种译本)、藏文本、蒙古文本、卡尔美克文本、满文本、突厥语系本、东伊朗文本等等,这足以证明该经在大乘经典中是流行独广的一部经典。1932年陈先生发表《莲华色尼出家因缘跋》,除考证敦煌写本与巴利文本异同外,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之异同,进而指出:“桔迁地而变枳,吾民族同化之力可谓大矣。”因此,陈先生的敦煌考据之学,其深层意蕴,往往在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冲突,并进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。

三、利用敦煌文书,不仅发现了宋明小说、宝卷弹词等

文学与佛都经典之间的源流，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传布过程的变化形态

佛教传入中国曾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，关于这一点，陈先生在其有关敦煌学论著中有许多精彩的见解。如《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》一文，陈先生指出：“佛曲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，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，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。后世衍变既久，其散文中偶杂以诗歌者，遂成今日之章回体小说。其保存原式，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，则为今日之弹词。”在此后发表的《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》一文，作者又重申了这一看法：“观近年之发现之敦煌卷子中，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，盖知宋代说经，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，多出于一源。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，盖有直接关系。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，所未尝留意者也。”在这里，陈先生从“文化史”研究的视角，指出宋明小说、宝卷弹词等文学形式与佛教经典之间的源流与演变关系。

此外，他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形态。他指出，寺院讲经多引故事，而故事一经演讲，便会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。据此，陈先生曾以《西游记》为例，对玄奘弟子的原型作了一一考证，从佛经故事中找到他们的“模特儿”。孙悟空的原型，陈先生认为由《贤愚经》中《顶生王升天因缘》和《罗摩衍那》中猴神哈奴曼的故事混合而成。而关于猪八戒的原型，陈先生曾引僧义净译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》中牛卧比丘惊犯宫女，国王大怒，欲严惩牛卧比丘，天神去救他而化为大猪的故事。关于沙和尚的原型，陈寅恪先生引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记载：“莫贺延碛长八百里，古曰沙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

逢诸恶鬼，奇状异类，绕人前后……”指出此即沙和尚故事的起源。所有这些，都充分表现出陈先生在学问上的独具匠心和渊博见识。

四、利用敦煌材料 爬梳辨析 钩沉索隐 补史籍所阙载

陈先生精通典籍，谙熟掌故，在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历史的过程中，无论在方法的更新上，还是在史料的认识上，都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。例如，对藏族伟大学者、翻译家法成的研究及评价，就表现了陈先生的远见卓识。关于法成之名，不载于史书，也不见于佛教记载，故其生平不可知。陈先生在研究北图及傅增湘藏敦煌本《法成大乘稻芊经随听疏》根据敦煌写本《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》等数种经卷题识，考证法成系唐文宗时期一吐蕃沙门，活动于甘州、沙州等地，一生译著浩繁，是当时有名的佛学大师，是“沟通东西学术，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”，从而使这个历史人物重新被人们所识。而在《韦庄秦妇吟校笺》中，陈先生则处处把韦庄及其诗作放于当时历史环境中，将文学记载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，互相印证，互相发明，指出秦妇自长安东奔洛阳之行程，实即韦庄本人所经历，弄清了这一争论已久的历史公案。

综上所述，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：不但在我国最早提出“敦煌学”的名称，从理论上阐发了敦煌文献的珍贵价值，而且在困难的条件下，利用敦煌资料，在文史佛诸方面研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陆庆夫.陈寅恪(1890—1969年)[A].陆庆夫,王冀青.中外敦煌学家评传[C].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2